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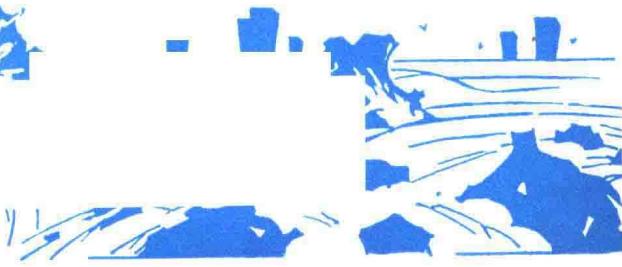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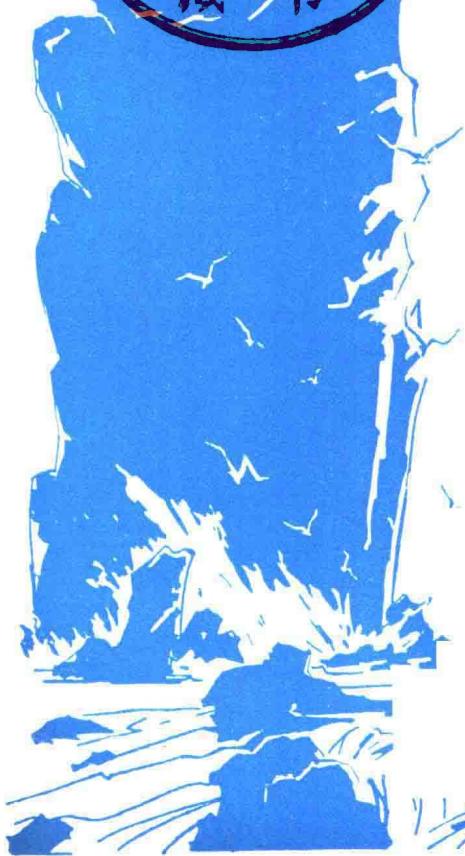
台 湾 小 说 选 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TAI WAN XIAO SHUO XUAN JIANG

台湾小说选讲

陆士清 等 编



台湾小说选讲(下)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37 千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1983 年 10 月第一版 198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6,500

书号：10253·004 定价：1.60 元

目 录

陈 映 真

乡村的教师.....	5
将军族.....	16
夜行货车.....	30

季 季

鸡.....	70
--------	----

王 楚 和

嫁妆一牛车.....	96
伊会念咒.....	117

黄 春 明

儿子的大玩偶.....	144
苹果的滋味.....	166

钟 铁 民

秋意.....	191
---------	-----

施 叔 青

约伯的末裔.....	206
------------	-----

杨 青 垚

工等五等.....	232
升迁道上.....	244
工厂人.....	272

王 拓

一个年轻的乡下医生	291
望君早归	307
张 系 国	
守望者	352
马 森	
孤绝	366
康教授的囚室	377
洪 醒 夫	
黑面庆仔	395
曾 心 仪	
彩凤的心愿	413
宋 泽 莱	
乡选时的两个小角色	443
编 后 记	478

陈 映 真

陈映真(许南村)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台湾乡土作家。本名陈永善,1937年生,台湾省台北县人。1961年在淡江文理学院毕业后,曾担任过《文学季刊》的编辑。1967年在离台赴美留学前夕被台湾当局拘捕,在土城、屏东、火烧岛监狱度过了八个年头。1975年回到故乡。

小学六年级时,陈映真读到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小说集成了他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使他知道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愚昧,知道了这“中国是我的”,“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他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生平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平凡而胸襟坦阔、脊骨挺直的中国人。”

陈映真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大学时代。大学二年级时(1959年),陈映真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面摊》。此后相继在《笔汇》、《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75年出狱后写文学评论。1978年春才重新拿起创作的笔。已出版的小说集有《第一件差事》、《将军族》、《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评论集有《知识人的偏执》等。

台湾乡土文学继承着早期乡土文学的传统,于六十年代后期形成潮流。这些乡土文学作家正视台湾的现实,关注处于社

会底层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小人物”的生活命运，陈映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早期的作品，大多渲泄知识分子的苦闷，色调感伤、悒郁。作品中出现的知识分子，不满于灰暗、困辱的处境，有改革现实、向往光明的要求；但是他们只“凝视着孤立的个人”，又缺乏坚持实践的勇气和意志，在现实中碰壁以后，就变得逃避退缩，自怜自伤，以致于自凌自虐，自我厌弃，最后“天使折翼，委落于深渊而成为恶魔”。《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就是这样。台湾光复后，吴锦翔从南洋回到故乡，怀着“他生平初次对祖国的热情”，献身给家乡的教育事业。面对褴褛肮脏的孩子们，他想：“务要使他们做一个公正执拗而有良心的人，由他们自己来担负起改革自己乡土的责任”；但是他不能理解正在激剧变化的古老的中国，感到了改革“无比的困难”，逐渐成了一个“懒惰的有良心的人”。最后，他自杀了。跟吴锦翔气质相近的形象，也出现在《我的弟弟康雄》、《故乡》、《一绿色之候鸟》等作品中。

1965年以后，陈映真的作品，逐渐增强了批判的嘲讽色彩。《最后的夏日》勾划了一群庸俗、下流的知识分子行尸走肉般的嘴脸。《唐倩的喜剧》写的更是“新儒林外史”。六十年代，在欧美经济和文化的冲击和腐蚀下，台湾某些知识分子竞相效颦，拾西方人的牙慧以自炫。作品通过唐倩和围绕她的一群“新儒”在追随时髦的潮流中走向堕落、背德、淫乱、迷惘和孤绝的描写，给台湾亚流的现代主义者以鞭打。

陈映真的创作，对于探索寄寓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传奇，以及他们迁居台湾后和台湾本省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在《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第一件差事》等作品中，陈映真让来自大陆的外省人和台湾省本地人同时登场，“将他们置于一个从来不认识大陆人、本省人的社会规律下，以一个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开展着繁复

的生之戏剧。”他的成名作《将军族》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爱情故事。小说的男主人公“三角脸”，是一个年近四十、退伍后在康乐队里混饭吃的大陆人；女主人公“小瘦丫头”，是一个年仅十五、六岁、为逃避被卖为娼的命运而来康乐队栖身的台湾女子。他们的出身、年令差别很大，但他们的命运和处境相同。他们同是枯肆之鱼，理应相濡以沫。他们相爱了。并于五年后相逢时，双双殉情。这里，台湾光复后存在的“大陆人”、“本省人”之间的误会、隔膜，在两个卑微的小人物身上消弭了。希望在台湾的“分离或有相分离危机的中国人重新和睦”，这就是陈映真的心声。

陈映真经过八年炼狱再出现在文坛的时候，显示了高远的视野和崭新的境界，作品的风格也完全从早期的迷漫着窒息的阴郁中摆脱出来，走入了光明开阔的天地。《夜行货车》是他复出的首篇，题材复杂、寓意深刻。它以外资入侵下的台湾整个工商社会为背景，通过对跨国公司中几个中国职员的不同生活态度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台湾社会商业化、经济国际化所酿成的病态。国际资本的豢养和物质利益的腐蚀，是怎样使林荣平这样的人丧失了民族气节和为人的尊严。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觉醒，他们为了保持民族情操，挺直脊梁，在洋老板的侮辱面前拍案而起……尽管陈映真从乡土母源中重建生存方向的想法，未必能疗救台湾的社会溃疡，但它仍不失为能引人思索的一种反省。在这篇作品中，陈映真又一次让“大陆人”和“本省人”同时登台，并使他们在“共御外侮”中结合。“在蕃子面前我们不要吵架”，寄寓着陈映真的深切期待。

继《夜行货车》以后，陈映真又写了中篇《云》等作品。《云》以台湾劳工运动为题材。台湾的劳资对立，劳工无权的地位、劳工运动遭扼杀的惨象，以及自上而下改革的虚假、美国式的民主

不过是幻想等，得到了生动的揭示。看看天上的云吧：“它们那么快乐、那么和平、那么友爱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轻轻地挽着。想着如果它们俯视着地上的我们，多么难为情。”这里表达了台湾劳工对于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社会的向往。这种向往又多么热切！遗憾的是“云”那样的生活不在台湾省的现实中，现实中的厂长和工人，像人和云离得那么遥远。

陈映真始终坚持写实主义的创作路线。他的作品总是饱含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总是寓于作品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之中，因而是有血有肉的。陈映真善于结构，善于创造艺术的氛围，因此作品的艺术的感染力比较强，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乡村的教师

青年吴锦翔自南方的战地归国的时候，台湾光复已经近于一年。那时候，差不多该活着回来的，都回来了。就如现在这个依山的大湖乡里的五家征属，都已不知不觉地从热切的悬念中吹熄了数年来的希望了。然而这样的幻灭並不意味着他们的悲哀。这大约是由于在战争中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应召出征和战死的缘故。加之以光复在这样一个朴拙的山村里，也有其几分兴奋的。村人热心地欢聚着，在林厝的广场上着实地演过两天的社戏。那种撼人的幽古的铜锣声，五十余年来首次响彻了整个山村。这样的薄薄的激情遮掩了一向十分喜欢夸张死失的悲哀的村人们，因此他们更能够如此平静而精细地撕着自己的希望——

“我们健次是无望的了，”老头说，诅咒着：“有人同他在巴丹岛同一个联队。那人回来，说，后来留在巴丹的都全被歼灭了！”

傍晚的山风吹着。人们一度又一度地反复着这个战争直接留在这个小小的山村的故事，懒散地谈着五个不归的男子，当然连吴锦翔也在内的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一年死去，或许这就是村人们对于这个死亡冷漠的原因罢。然则，附带地，他们也

听到许多关于那么一个遥远遥远的热带地的南方的事：那里的战争、那里的硝烟、那里的海岸、太阳、森林和疟疾。这种异乡的神秘甚至于征人的葬身于斯的事实，都似乎毫无损于他们的新奇的。

但是这一切战争的激情经过了近于一年的时光，已经渐渐的要平静下来了。一切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坡上的太阳依旧是那样的炙人，他们自己也依旧是劳苦的，并且生活也依旧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恶意的追赶。宿命的，无趣味的生活流过又流过这个小小的村社，而且又要逐渐地固结起来的了。

在这样的时候，吴锦翔悄然地归国了。村人们在雨天的懊恼和别人的肩项之间，惊叹地注视着这个油灯下的幸存者：一个矮小，黝黑的（当然啦）但并不健康的青年。森黑黑的胡髭爬满了他尖削的颊和颌，随着陌生的微笑，这些胡髭仿佛都蠕动起来了。

“太平了。”他说，笑着。“是呵，太平了。”大家和着说。他竟还记得乡音呵！当然的，当然他记得。只是这人离开故乡已有五年。他还说，太平了。众人都兴奋起来。

“我们健次呢？”老头说。是呵，他们都无声地和着说，健次他们呢？回来吗……

吴锦翔出乎众人意表地只回了一个惶恐的眼色。他搬着手指头，咯吱咯吱的声音在静默中响起来真是异样的。

“他们一直送我到婆罗州”，他站了起来，“我在巴丹就同他们分手了。”

人家感动起来。那么遥远的地方呀。他们说，婆罗州，日人讲的 Borneo，多么遥远的地方呀。归来的青年终于回到他那不自在的微笑里，他说：

“太平了。”

“太平了。”他们和着说。可不是的吗？即使说征人都已死去，或许说不定也会象吴锦翔一样突然归来的罢。然而战争终于过去了。夜包围着雨雾的山林。月亮照在树叶上、树枝上。闪耀着。而山村又一度闪耀着热带的南方的传奇了。他们时兴地以带有重浊土音的日语说着 Borneo，而且首肯着。

二

寡妇根福嫂变得健硕而且开心了。她不但意外的从战火里拾回她的儿子，而且更其重要的是：第一，锦翔依旧象出征前那样顺从和沉静；第二，由于他自小以苦读闻于山村，现在竟被乡人举到山村小学里任教去了。这是体面的事。一向善于搬弄的根福嫂，便到处技巧地在众人前提起她战争归来的儿子，一等大家少不得要称赞他的顺从、他的教师的职位的时候，她便又爱着而且贬抑地自谦起来。

“是啦，”她总是这样地说：“是啦。不过他依旧是不更事的。象他那样的身体，象他那样的人，怎样也不是能够下田的料唷……。”

在她这样说的时候，她的母性的心是饱满的了。她是个力强的母亲，健康而快活的。她评论着二十六岁的儿子好象他仍旧是个虚弱的孩子一样。而大约也正是这种母亲的欲望，使她执拗地继续租种着一块方寸的小园地，天一亮便去赶镇上的集。她要养活儿子，她满心这样想着，摇晃着肩上的担子。太阳从山坡后面的断岭升了起来。清晨的雾悒结在坡上、田里和长而懒散的村道上。

在四月的时候，吴锦翔接了这个总共不到二十个学生的山村小学。五年的战火，几乎使他因着人的大愚和人的无助的悲

惨，而觉得人无非只是好斗争的，而且必然要斗争的生物罢了。知识或者理想在那个定命的战争、爆破、死尸和强暴中成了什么呢？然而当战争象梦一般过去的时候，当他又不可思议地活着回到这个和平而朴拙的山村以后，因着接办这样一个小小的学校，吴锦翔的小知识分子的热情便重又自余烬中复燃了起来。

忽然所有他在战争以前的热情都苏醒了过来；而且经过了五年的战争，这些少年般的信仰甚至都载着仿佛更具有深沉的面貌，悠悠的转醒了。由于读书，少年的他曾秘密地参加过抗日的活动；由于读书，由于他是出身贫苦的佃农，对于这些劳力者他有着深的感情和有所为的同情。而且也由于他的读书和活动，锐眼的日本官宪便特意把他征召到火线的婆罗州去。“而我终于回来了。”他自语着，笑了起来，搬着指头咯吱咯吱地响着。爆破，死亡的声音和臭味，热带地鬼魂一般地婆娑着的森林，以及火焰一般的太阳又机械地映进入他的漫想里，然而在这个新的乐观和入世的热情之前，这些灼人的悲惨无非只是简单的记忆罢了。而何况在他里面，有一种他平生初次的对于祖国的热情。“这是个发展的机会呀。”他自说着，从小学的大而明亮的窗口望着对面的山坡，那些梯子一般的水田、那些一任山坡上的太阳烘着褐黑色的背脊的农民们；那些窗下山脚的破败但仍不失其生命的农家。四月的风揉着初夏的热，忽忽地从窗子吹进来，又从背后的窗子吹了出去。一切都会有好转的，他无声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至少官宪的压迫将永远不可能的了。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将好转。

开学的时候，看着十七个黝黑的学童，吴锦翔感觉到自己的无可说明的感动。他爱他们，因为他们是稚拙的；爱他们，因为他们褴褛而且有些肮脏。或许，这样的感情应不单只是爱而已，他觉得甚至自己在尊敬着这些小小的农民。他对他们笑着，简直不

知道应该怎样把自己的热情表达给他们。务要使这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他曾热烈地这样想过：务要使他们做一个公正、执拗而有良心的人，由他们自己来担负起改革自己乡土的责任。然而此刻，在这一群瞪着死板的眼睛的无生气的学童之前，他感到无法用他们的语言说明他的善意和诚恳了。他用手势，几度用舌头润着嘴唇去找寻适当的比喻和词句。他甚至走下讲台，温和地同他们谈话，他的眼睛燃烧着，然而学童们依旧是局促而且无生气的。

五月的下旬，国定的教科书运到了。教师吴锦翔一直是热心的。设若战争所换取的就仅是这个改革的自由和机会，他自说着；或许对人类也不失是一种进步的罢。五月的风吹着，他已经习惯于这山岗上的风声和竹筱拽动的音响了，只看见山坡的棱线上的丛树，在风里摇曳于五月的阳光之中。这世界终于有一天会变好的，他想。

三

第二年入春的时候，省内的骚动和中国的动乱的触角，甚至伸到这样一个寂寂的山村里来了。新的激情再度流行在简单而好事的村民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或者喧说着夸大过了的消息。这时候，教师吴锦翔逐渐的感到自己的内里的混乱和朦胧的感觉。他努力地读过国内的文学，第一次他开始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去看他的祖国。过去他曾用心地思索着中国的愚而不安的本质，如今这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而且由于这个理由，他对于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可说明的亲切了。他整日阅读着“像一叶秋海棠”的中国地图，读着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岳，每一个都市的名字。他仿佛

看见在浑浊而浩荡的大河上的舢舨，宿着龙和留着白胡子神仙的神秘山峦；石板路的都市，挂满了优秀的正楷写成的告示的都市；贫穷而肮脏的、安命而且愚昧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但又执着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感情中，他固然是没有像村人一般有着省籍的界蒂，但这样的感情除了血缘的亲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而暧昧的悲哀了。这样的中国人，他想像着过去和现在的国内的动乱，又仿佛看见了民国初年那些穿着俄国军服的革命军官，那些穿戴着像是纸糊的军衣军帽的士兵们，那些烽火，那些颓圮，连这样的动乱便都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了。这是一个悲哀，虽其是朦胧而暧昧的——中国式的——悲哀，然而始终是一个悲哀的；因为他的知识变成了一种艺术，他的思索变成了一种美学，他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文学，而他的爱国热却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中国式的！）血缘的感情罢了。

幼稚病！他无声地喊着。这个喊声有些激怒了自己，他就笑了起来：幼稚病！呵，幼稚病！有什么要紧呢？甚至“幼稚病”在他有着极醇厚的文学意味的。他的懒、他的对于母亲的依赖、他的空想的性格、改革的热情，对于他只不过是他的梦中的英雄主义的一部分罢了。想着想着，吴锦翔无助地颓然了。中国人！他嚅嗫着。窗外的梯田上的农民便顿时和中国的幽古连接起来，带着中国人的或另一种笔触在阳光中劳动着，生活着。

入夏的时候，他已陆陆续续的看到许多的国内的人，戴着白色的草梗西帽，穿着白色的南方衬衫，靛青颜色的软而宽的裤子，脚上是长的白袜子和黑布鞋。这虽然和意想中的中国人有些距离，然而这距离是极易于和解的。撤退的那一年，有一队军队驻在村外的祠堂，他特意的去看过他们，他们的笨拙绑腿，军械的油味，兵的体臭，军食的特别味道，每一样事物都是典型的，他仿佛从他们看见了数十年来的中国的兵众了。兵众的那种无可如

何的现世的表情他是能一张张的读出而且了解的。这样古老而且奇怪的中国呀，他自说着。走在乡村道上，感到一种中国的懒散。中秋方才过去，一入晚便看见一轮白色而透明的月挂在西山的右首。田里都灌满了水，在夕阳的余辉中闪烁着。不久便又是插秧的时节了。秧苗田的细致的嫩绿在晚风中温文地波动着。吴锦翔吸着烟，朦胧之间想起了遣送归乡之前在集中营里的南方夕靄。这桃红的夕靄中又无端地使他想起中国的七层宝塔，于是他又看见了地图上的中国了。冥冥里他忽然觉到改革这样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的无比的困难来。他想象着有一天中国人都挺着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设着自己的情形，竟觉得滑稽到忍不住要冒渎地笑出声音来了。

四

逐渐地，过了三十岁的改革者吴锦翔堕落了。他如今只是一个懒惰的有良心的人；他决不再苦读到深夜如少年时一般，因为次日的精神不振对于学生是一种损失，每学期剩下来的薄本一定卖掉以添购体育用具；他从没有让学生打扫自己的房子或利用他们的劳力为自己的厨房蓄水；他为贫苦的学生出旅费参加远足。凡此种种，当然少不得有人嘲笑他的愚诚的。但这些行为对于吴锦翔毕竟不只是道德或良心而已；而是一个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崩坏后的遗迹。所以对于那样的嘲笑他倒是能够承之有余了。他的另外一个基于同一个的良心行为是他的坚持不娶。这是颇使根福嫂伤心的事。可是结婚对于吴锦翔，将会成为一个小的社会问题。这个堕落了的改革者连自己的生活都懒得料理了。此外，他已经在他的排遣之道了：偶而到镇上去看一场便宜的电影，顺便带回来几本出租的日文杂志，津津有味

地读着他们的通俗小说。但另外的嗜好则就有些可责了：他成了一个喝酒的人。不过他毕竟是个温和的人物，他没有什么酒癖，但偶尔也会叫人莫名其妙地醉着哭起来，象小儿一般。不过这到底还是少有的事。

那一年的夏天，他赴了一个学生的席。这是他的学生第一个应召入营的，席筵摆在正厅里，围坐着一家大小。红柜桌子下排着一大瓶一大瓶的土米酒。在灯光下，每个人都兴奋着，都红着脸。

“身体得顾着呀！”老头说，伸着一只酒杯到青年人面前。

“当然的。”青年人说，端起自己的酒，喝了，说：“谢谢。”

青年人笑着，注视着狂饮的老师。一只大狗在桌子下咯吱咯吱地吃着骨头。

“老师！”青年人说。

“来，喝酒罢。”吴老师为学生筛着酒，眯着眼。除了刮得发青的下腮子脸，满都通红了。

“可也真快。”老年人说。

“快呢。”大家和着说。青年人兀自笑着，都沉默了。

“快什么，嗯？”吴老师说，强瞪着眼：“快么？……人肉咸咸的，能吃么？嗯？”

大家笑了起来。

“能吃的吗！人肉咸咸的啦，岂是能吃的吗！”他细声地说，询问于老年人。老年人笑着拍着他肩，说：

“自然，自然。人肉是咸的，那能吃呢？”

“我就吃过。”大家都还懒散地笑着，“在婆罗州，在Borneo！”

于是大家都沉默了。

“没有吃的，就吃人肉。……娘的，谁都不敢睡觉，怕睡了就被杀了。”他眯起眼睛，耸着肩，象是挣扎在一只刺刀之下。